

話劇創作散論

趙尋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話 剧 創 作 散 論

趙 寻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 84 号)

北京市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 0006 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00·146 字数 120,000 开本 860×1180mm 1/32 印张 5.5/16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7.00 元

目 次

話劇《春風吹到諾敏河》中的三個主要人物.....	1
評《考驗》.....	11
談《劉蓮英》.....	22
從《如兄如弟》談戲劇衝突.....	25
看話劇《前夜》.....	35
論話劇《同甘共苦》的人物創造.....	39
談獨幕劇《王三》及其他.....	53
堅決克服資產階級的文艺思想，為提高刊物的思想性而斗争.....	67
表現新生活的新喜劇.....	87
把戲劇創作向前推進一步.....	96
要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觀眾.....	109
胡風的語言及其他.....	123
多寫些獨幕劇.....	132
“向前看！”.....	138

不要魚目混珠.....	147
不可因噎廢食.....	150
讓青年作者深入生活.....	154
談“劇作者到劇院(團)去”的問題.....	158
后記	163

話劇《春風吹到諾敏河》中的三個主要人物

(四幕話劇 安波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話劇《春風吹到諾敏河》最近在全國各地廣泛地演出受到人們的重視，劇本通過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過程，描寫了在執行黨的發展互助合作運動的方針中兩條路線的鬥爭；它的成就不僅在於作者選取了一個有現實意義的主題，更可喜的是作者刻劃了一些具有鮮明形象的人物，三個主要人物——高振林、崔成、孫守山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

作者比較成功地創造了正面人物的明朗形象，較之其他劇本中所寫的正面人物，《春風吹到諾敏河》是前進了一步，支部書記、合作社主任高振林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比較深刻的。這個正面人物之所以寫得比較好，在於作者形象地描繪了他所具有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品質。當合作社初建時，群眾思想還很混亂，社員勤惰不一，工作制度尚未訂立，孫守山的退社引起某些中農的思想動搖，領導人員之間意見不一，影響了干部的情緒，在這一系列的困難面前，高振林表現了共產黨員對人民事業忠誠負責的精神。當然，在困難中他不是沒有情緒上的苦惱和思想鬥爭的，他也這樣想過：“唉，這是何苦來呢！……閑的人家亲戚不是亲戚，朋友不是朋友，連老王都有不干的心啦。”（第九十四頁）可是：

高振林(坐下来,低头沉思,片刻,用手輕敲着桌子,独語)对呀,大家对我有意見,是怨自己的能耐小,我对人家有意見,那就怨我的度量不大了!……(第九十五頁)

就是这样,高振林用自我批評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他对待同志却是寬厚又有原則的。对崔成生活上的关切几乎是无微不至,甚至比崔成自己还想得周到。但是,在对待中农的原则爭論上,却絲毫也不肯妥协。他自己虽然也是农民出身,由于党的长期培养和教育,在思想上已突破了原来阶级的限制,他已经习惯于从群众利益的观点来看問題。有一次他的“大鐵青”被打坏了,馬的損失对于一般农民不是一个小問題,別人都因此替他难受。而他首先想到的是合作社需要建立責任制。他常常因为忙于村里社里的工作而少管理家务,对妻子感到抱歉。这种因公忘私的优秀品質,正是先进人物具有的特征。

这种社会主义的思想品質,不是用外表事实的罗列和口头解說的方法,而是通过人物的个性,形象地表現出来的。我們熟悉高振林正如我們在农村中朝夕相处的某些村干部一样,他是具有农民的特点、更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他也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需要处理自己的生活。当我们看到他虽然很忙却宁愿自己多做点活,让孩子高兴地去摸魚玩,这种父亲的心情多么叫人感到亲切!当我们看到他因为一个接一个工作的困难压下来,自己内心煩躁,对妻子好意的埋怨說了两句重話,而马上又意識到不应该,这种夫妻之間的感情写得多么細致!他有着农民朴实穩重的个性,也具有农民特有的风趣,甚至在尖銳的斗争面前,也不是那样声严厉色、气势逼人的。例如当他到孙家去解决孙守山因退社而引起的家庭冲突时,当他与崔成之間展开激烈的思想斗争时,

他所表現的也是平易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他爱說爱笑，因而群众喜欢和他接近，联系群众，依靠党的领导，这就是他克服困难力量的源泉。高振林那一段满怀感情的回忆（第八十四頁）是动人的，他牢牢地記住了刘政委牺牲前叮囑他的話：“老高，要工作咱就不怕困难！你想雪山、草地怎么过去的？你咬咬牙、問問党，問問群众，什么困难都好办！”事实証明了这个真理：在今天，如果离开了党和群众，任何英雄人物都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个正面人物所以写得比較好，还由于作者善于集中地运用矛盾冲突，并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充分地表現人物的思想、情感、性格。风雨之夜的那場戏，（二幕一場）所以那样精彩动人，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由于作者正确地采用了这种现实主义的手法，在这里，高振林被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他成了当时生活——矛盾冲突的主人。在这里，社內外的問題、党內外的問題、家內外的問題、干部之間的問題、群众之間的問題、最后还有自己对自己思想斗争的問題，一个接一个的問題、一层加一层的困难，放在高振林的面前，需要他去解决。于是他在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中，經受了考驗，表现了使人感动的精神力量，就是这样，人物在尖銳的矛盾与艰苦的斗争中被生动地刻划了出来。但是，很可惜地，这种方法在剧本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高振林也在这样的場合出現：当問題已經发生，斗争已經展开，作为一个掌握政策的人，用正确的道理來說明問題，解决糾紛。二幕一場以后，高振林虽然处理了不少具体問題，但人物性格并沒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丰富。

对高振林这个人物的描写上重要問題在于他思想上的缺点，虽然他在掌握互助合作的政策上基本是正确的，但对中农問題在分寸的掌握上还嫌不够十分准确，这里隱現着作者一些保守迁就

的情緒。這一點具體表現在高振林對孫守山的態度上較多。孫守山因為“社里干活勤快手和懶蛋子分不清，還因為馬租子評少了，馬草料拿多了。”（第六十七頁）要退社，這些問題不仅是孫守山一個人的問題，也是合作社當時即應解決的問題，高振林也說：“這提得可都挺要緊呢”；但在此我們看不到高振林爭取孫守山不退社的重大努力，相反地，在某種程度上採取了放任的態度，只是答應了他自由退社：“……不要說一年，再看看也行哪！你們什麼時候看中了，就什麼時候入，”固然高振林的爭取也可能因為孫守山早有拉腳、販賣瓦盆這些個人發財的計劃而不成功，但是揭穿了他這些表面的理由不是更可顯露他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實質嗎？第二幕中，夏鋤時節，時逢大雨，孫守山勞力不足，地剷不完，這時高振林發動大家幫助了他，這不但是合作社對單干戶的照顧，也表現了集體勞動的優越性，在這活生生的事實面前，應該是個很好的機會在政治上、思想上對個體農民進行一次集體主義的教育，可是我們一直到最後孫守山宣布要入社時，還看不出來他原來的思想有什麼顯著的變化。高振林的基本態度，宣教委員王永說得比較明確，當有一次兩個青年農民把董福、孫守山二人“插棍”，因各有私心爭吵不合的事，編成了快板唱着玩，王永忙喝止說：

“你這個順口溜是誰編的？怎麼能這個編法呢？上一回種地那節，支書（指高振林）不是批評過你來嗎？說咱們國家不管合作社、互助組，還是單干戶，都是一樣待承，一樣領導，你們這樣胡糟踈還行啦，這不合乎政策！”（第一三五頁）

自然，歧視和打击單干戶是錯誤的，必須適當地照顧他們。但由於經濟性質的不同、生產條件的不同，對合作社與個體農民事實上不可能“一樣待承，一樣領導”這是很明白的事。如果不顧發展生產

的需要，只求形式上的一致，这倒是不合政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农民“走慣了走熟了的道路”，在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我們不能設想和农民沒有什么矛盾和斗争，正如崔成所說的：

“……張部长不单說要團結他們，还說要改造他們呢！这么多年你还没有看透嗎？你要让他一尺，他要你让他一丈，你对他格外照顧，他还觉得是应分的呢！……”（第一三七頁）

崔成的粗暴态度是不对的，但他的这些話还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們和中农團結的目的是为了領導他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他們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的團結，就必定有斗争，这种斗争虽然是有分寸的，然而在原則上是不能让步的。在崔成与孙守山的斗争中，崔成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态度是錯誤的，應該批評，高振林严格地批評了他，这是对的。但是，孙守山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更是錯誤的，更應該批評，但却批評得不够，这就显得高振林思想上对个体农民政治上的帮助不够重視，領会党对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針不够全面，因而，也使剧本在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上受到影响。

三个主要人物中写得最好的是孙守山。作者运用丰富的农民語言和生活細节的描写，刻划出一个生动、真实的中农形象。从孙守山身上我們具体地体会到中农的两面性：一面是劳动者，他热爱劳动，看不惯于荒地松懈怠工；他爱惜自己的牲口，牲口少吃了点他都感到心疼。另一方面，他是私有者，自私保守，眼光短小，他爱自己的馬却打別人的馬；他自己自私自利却說飼养員韓四“私心特大”；他看着大家說合作社好，自己也就入了社，但是又怕集体損害了个人的利益，苦悶动摇，要求退社。这些阶级的共同特征通过孙守山的个性微妙地表現了出来。作者在一幕二場中非常形象地

描繪了这个中农的各种心理活动。这一場精彩的戏，表现了作者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描写人物的艺术才能，全場自始至終，甚至每个人物的每一段台詞都是生动而有意义的，尤其是孙守山父子的一段对话非常恰当地表现了这个中农的思想与心情。例如：

孙守山：新农具？連他媽給他們留下的两只手还使唤不好呢，还新农具！可是咱们要自己干呢？出去多拉一趟脚，就是二十来万。到秋后，三四半馬还得一个变俩？你董大爷說啦，贩卖瓦盆可挺挣钱，咱就那么干！……你看早先头哪家过好日子的，不是将本滚利，慢慢滾大的？（第五十二頁）

这就是孙守山向往资本主义的思想內容。就是由于这种向往，他要坚决退社，高振林一再来向他征詢意見，他閉口不提。当孙有才問他为什么不說时，他教訓儿子：“……你年轻，还不懂这个，人情不能頂飯吃呀！我既然誠心不入啦，还給他提意見干啥！”既然自己不在內，管他合作社搞好搞坏，这就是他个人主义的处世哲学。甚至在某些微小的，不被人注意的一两句对话上，作者也沒有放松对人物个性的刻划。孙有才心緒煩乱，无意地磕打着柜上的一个小銅盒。孙守山忙走过去夺过銅盒来：“你他媽別磕打，我还留着裝菜籽呢！”連一个小銅盒都如此爱惜的人，听到要串換他的好地，他暴怒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作者創造的中农孙守山，整个說來（特別是前半部）不但具有阶级性的特征，而且具有艺术的真实。

但是，在一幕二場描写得非常生动的孙守山这条思想情感的线索，以后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对孙守山的轉变入社，作者沒有注意发掘他内心思想情感发展的規律，仅仅給他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幸事件，并和合作社的优越性相对比。这样的描写一般是符合生活的真实的，孙守山遭到的“天灾”与“人禍”，（“天灾”是正

逢多雨，草苗齐长，人力不够，割地不及；“人禍”是“插秧”的对象正碰上尖头董福，贩卖瓦盆又赔了本。)不正是与小农經濟的根本弱点相联系着嗎？合作社的优越性以及对它的援助，不正是吸引他入社的力量嗎？但可惜的是，在这里都成了孤立的生活現象，而沒有能够和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一幕二場中那样生动而具体地展示了孙守山的内心世界在以后一系列的事件中有些什么发展与变化呢？我們看得不太清楚。所以，最后当孙守山一声宣布要求入社时，感到有些突然。中农走向合作化，这不仅是主题和政策的要求，也是生活发展的規律。如果剧本通过人物心理的刻划，写出了这种生活发展的規律，把生活現象与政策、主题相结合着的内部联系揭示出来，而不是用事件加事件的数学法則来促其转变，这样孙守山的轉变就有他的必然性。

三个主要人物中崔成虽然是写得比較差的，但在前三場中这个人物还是思想明确，性格可愛，給人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开始时急于要办社，还没有等大家充分討論，就以为群众沒有意見了，不等上級批准，早把馬棚盖好，立刻要拉馬入社，表现了他主观急躁的心情。但是首先就碰到了他亲戚孙守山的釘子，孙的拉馬退社，引起了崔成的憤怒，“上火上得脖子都肿了”，但是，他見着孙守山的儿子有才时反来安慰有才：

……这几天我也挺窝火呢！唉！沒有法子！为了革命工作，为了群众，就得克服点啦！有才，我看你也別懊躁了，懊躁出病来可犯不上。（第五十九頁）

这里不但表現崔成对革命的忠誠，也表现了对同志的关怀，再如：

……这就是节骨眼！不管家庭怎样扯腿，該干还是得干哪……你爹就是倔性点，可是該斗争还得斗争！当然啦，方式不可不讲究，可是

也不能怕。年輕人怕什么呢？你要前怕狼后怕虎的，就啥事也成不了。
(第六十頁)

这些富有性格特征的對話，表現了人物情感的多方面。當人們理解了崔成，感到了他的真實可愛時，才會對於糾正他的思想錯誤感到更深切。

但是，崔成的性格到後來就漸漸走樣了，二幕以後，他僅僅是簡單地作為一個“反對派”出現的，只要高振林提出的意見，不管有理無理，他都反對。比如實行小包工責任制，本來可以督促大家自動地多干活，這樣的作法顯然合乎崔成個性的要求，但他也堅決反對。又如對單干戶的態度問題，按照崔成的爽直個性和對上級的信任，區上回來後他自己也說問題解決了，按理在第三幕中高振林号召幫助孫守山時，不會引起他那樣強烈的反對，可是他不但態度不好，接着又要派孫家出民工，看來，是有意找別扭，甚至有點報復情緒。這樣的描寫，連同他另外一些大大咧咧，咋咋唬唬，意氣用事，個人主義的態度、作風，使人感到崔成的錯誤，不仅是一般性的思想問題，甚至品質上也有問題。這就與原來劇本中所介紹的：“扛長活出身”“在庄稼人堆里不是千里挑一，也是百里挑一”“真心愛咱們的黨和新國家”這樣的干部就不大相合。

崔成和高振林的衝突貫穿了全劇，但兩人在思想上的鬥爭却一次也沒有正面展開。劇中表現高、崔衝突共有四次，每次都是剛一接觸就被作者有意地避開去了。這種表現劇本主題思想的重大鬥爭，是觀眾所關心的，希望能在舞台上看到它的出現，但作者對這個觀眾所迫切需要了解的問題沒有予以清楚的交代。因為對崔成思想發展和內心活動的不夠了解，就使人感到最後崔成的轉變不太自然。崔成的思想問題，曾經在支委會上的討論，經過老高等

的多次談話，經過領導上的具體幫助，一直未能得到解決，而高振林這次的一番解說（四幕一場）就能徹底轉變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崔成的思想問題本來早可解決，為什麼要延遲到四幕一場，戲快要結束時才來解決呢？這是在寫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中，作者還有一些事件沒有描寫或交代，從醞釀建社到豐收，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一一加以說明，最後，才能有機會來解決崔成的思想問題。劇本情节的安排不是根據主要人物的行動來表現的，而是脫離了主要人物按一般合作化運動過程的階段來安排的。為了服从這種事件發展的需要，結果損害了人物的性格，崔成的覺悟時間也不得不因而延長。在這一漫長的時間中，作者無法安排人物的活動，只好讓他病倒，使人物在一個靜止的、被動的狀態下，他的轉變也只有用一種人工的、外加的辦法，不是人物在行動中，受到事實的教育，也不是在思想鬥爭中自然發展的結果。這樣，崔成的轉變當然會使人感到牽強無力了。

應該是按照人物的行動來表現事件呢？還是依從事件的過程來設計人物？我們看到作者多少是有意根據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來描寫人物的，而不是通過典型人物性格的描寫來表現合作社的成長。這樣，就不能不使作者及其人物受到他預定要表現運動中的幾個發展階段（春耕、夏鋤、秋收……）的約束，以致妨礙了人物性格的描寫，並給自己帶來一些困難：寫事實的過程就不能不在作品中解決一系列的實際問題，同時，事實的發展過程中發生的重要事件，不止一桩，顧此失彼，挂一漏萬，反倒不能寫得完全。如果是着重寫人，不但可以從人物的行動中看到今天的鬥爭，而且，他是從昨天生活過來，也可以從他身上看到過去的經歷；他將往明天走去，在今天的生活中必定表現了他對將來的打算；這樣，從人物身

上倒可以更集中而形象地表現了事物发展的過程。

寫事實的過程，要解決的問題多，要說明的政策也繁，而且由於實際情況的發展，具體的政策也並非一成不變的；當時所認為重大的問題，現在也許已經解決了。這就會趕不上現實，追不上政策。如果着重寫人，通過人物的描寫反映時代的精神面貌，把人物的內心活動、思想本質剖視給觀眾，給人以精神上的教育，這樣，縱或描寫的那些事件已經過時，但這種社會主義的精神給人民的教育作用是永遠不會過時的。

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要求人物和事件是完全溶合無間的統一體，人物在典型環境中的具體行動就產生情節或事件，這些情節或事件正是為了描寫人物而存在的。作者曾經運用這種創作方法在一幕二場與二幕一場中取得了成功，深刻地刻劃了孫守山與高振林那樣動人的人物形象。但到後來沒有堅持下去，當人物性格的發展與事實過程的發展發生矛盾時，作者沒有正確地選擇前者，而屈從了事實過程發展的要求，因而劇本後半部中的人物，就不及以前那樣生動飽滿。

《春風吹到諾敏河》在創作方法上雖然還存在着一些缺點，但總的說來仍是一個有意義的好劇本，它的成功之處是主要的。在目前話劇創作，尤其是描寫農村生活的劇本中，《春風吹到諾敏河》的產生是個可喜的收穫，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并從它的創作經驗中，吸取有益的東西，來提高我們戲劇創作的水平。

1954.3.27.

(原載1954.7.3.《人民日報》)

評《考驗》

(五幕話劇 夏衍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夏衍劇作的特色是：尖銳、鮮明的思想內容和簡練、單純的藝術風格。他的新作《考驗》繼續并發揚了這些特色。

近來，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狂濤巨浪前面，日益明顯地看到我們的思想是怎樣落在現實鬥爭的後面。問題還不僅在於我們思想落後，更在於有些人不但看不到自己的落後，反而驕傲自滿、脫離群眾，橫躺在前進的路上，成為人們前進的絆腳石。劇本《考驗》雖然取材於五三年华东“新三反”運動，但所批判的思想作风，對今天的現實仍有着很大的教育意義。

《考驗》從工業方面反映了思想戰線上一個重要的鬥爭——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領導思想作风的問題。我們有不少這樣的領導干部，他們具有對新鮮事物的敏感和進取的精神，勤懇虛心地完成了黨和人民交付的任務；但是也有這樣的領導干部，他們以個人主義、官僚主義的态度來對待黨和人民的事業。兩種干部，兩種思想的鬥爭，實質上是日趨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在我們內部的反映。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面臨着一個新的、比過去所經歷的更為嚴格的考驗——社會主義革命的考驗。有人受得起這個考驗，而且成為創造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力量，也有人經受不住，甚至終於從時代的列車上摔了出去。《考驗》严肃地提出這個重大的問題，並且形象地做出了解答，讓我們從這一面思想的鏡子中，得到印証、警惕、啟發和

提高。

《考验》是通过严密的戏剧结构，从人物个性的创造中，来揭露与展开这一思想斗争的。作者这样安排了两个主要人物的关系——丁璋与杨仲安，他们是十多年来长期合作的老战友，今天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岗位上又相遇了。新的合作使他们感到兴奋，但思想上的距离又不能不使他们苦恼。杨仲安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与丁璋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作风终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方面是深厚的友谊，一方面是原则的斗争，使两个不同思想、不同性格的人物真实而生动地被塑造了出来。

《考验》的成就之一，首先是对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思想性格刻画的成功。作者以政治透视的能力和概括集中的手法，突出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本质。杨仲安这个人物的创造是比较典型的。人物出场不久，在举止言谈之中，作者明确而简练地介绍了他的思想情况。丁璋与杨仲安相见的一场是第一幕的重点，生死之交，久别重逢，这里该有多少可写的好“戏”，有多少可发挥的感情，但是，作者舍弃了这些一般的写法，一段简短的对话，着重在人物思想的描绘。例如当丁璋向杨仲安问到工厂情况时，杨仲安说：

你放心，有我……我摸了三年，差不多了，已经有了底儿。

……现在办事不容易，上面要检查，下面有意见，好了还要好，完成了生产任务，还要求什么按节奏生产。工厂，可不比部队，凡事都得民主，凭良心，我这个人，不算不民主吧，可是这次党代表会議，意见就提了一大堆。老丁，你下去，得有个精神准备。（纵声大笑起来。）

虽然是三言两语的随意谈心，这个骄傲自满、不听批评、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人物的轮廓就清清楚楚地被勾画了出来。这样准确、简练地描绘人物性格的对话，在剧本中并不少见，不是具有丰